

创新驱动创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 葛宝山 赵丽仪

摘 要：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将创新和创业理论有机整合，形成创新驱动创业（IDE）这一符合新发展阶段的原创性构念是回答时代之变的创新举措。本文基于 Shaker A. Zahra 教授关于 IDE 的论述，从 IDE 动机的视角，对 IDE 的特征进行了阐述，认为 IDE 是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其中创新驱动因素可分为技术、制度和商业模式三类。创新驱动创业就是在创业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解决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实现企业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IDE 的关键是解放两种生产力，即解放科技创新人才的生产力和企业家的生产力。IDE 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多个市场主体的作用。最后，本文从不同企业主体视角对未来 IDE 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创新驱动创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展望

一、IDE 的主要特征

Zahra 教授的研究涉及管理学领域的多个方面，研究影响范围相当广泛，得到了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与学科广大学者的认可，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创业领域，他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他的研究是从初创企业到公司创业，再到公司创业中的知识管理活动以及全球创业生态系统，将理论构建与创业实践相结合。一方面，他强调创业理论的构建，认为基于理论的研究能够极大地帮助研究者们理解复杂的创业现象，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创业者在构思、发展和管理新企业时所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他也同样关注创业实践问题，他的研究在全球多个国家进行，主要在美国，还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72091310；7209131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972083）的资助。

包括中国、巴西、印度、意大利、西班牙、丹麦、韩国等。这些研究与各个国家不同合作者共同完成,应用了多种理论和方法,涵盖了多个层面的分析。此外,他的研究多聚焦于高科技行业,包括机器人、软件应用、全球移动应用、电子游戏、制药和纳米技术等^①。通过对全球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企业进行大量调研,检验理论的有效性,让理论指导创业实践,使理论为创业者提供重要的洞察力,让他们了解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从而降低创业失败的概率,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效的建议,使他们能够制订计划,更好地培育和支持创业活动。Zahra 教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提高了创业领域研究的严谨性和相关性,对后续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论及 IDE 的时代特点时,Zahra 教授在其 IDE 专论中提出“IDE 与传统创业的显著区别就是 IDE 不仅追求利润,还寻求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 IDE 服务于高质量发展。事实上,创新驱动创业(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IDE)是新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与时俱进的创业理论。创新驱动创业概念是在丰富的创业实践和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国内,在实践层面,创新驱动创业源自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把创新驱动视为发展动力问题。2012年,党的十八大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国家将创新摆在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2016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将创新驱动视为优先发展战略,国家从

宏观整体规划方面注重创新的关键性作用,旨在依靠科技创新来带动国家实现全面创新,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布局中占据关键核心地位(蔡莉等,202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所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 2022》显示,中国的国际排名已由第 34 位(2012 年)上升至第 11 位(2022 年),有力证明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助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学术领域,IDE 可追溯到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创新。这一点也得到了 Zahra 教授的肯定。Zahra 教授在其 IDE 专论中指出,“许多人将 IDE 与柯兹纳和熊彼特关于创造性破坏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建立在 IDE 基础上的初创公司通常专注于进入新的市场——通常是未知的或未经证实的市场,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熊彼特发现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将创新定义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组合(Schumpeter, 1934)。Porter (1990)在其基础上提出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概念,后续 Drejer (2004)、Toivonen 和 Tuominen (2009)、Toth 等(2022)、Li 等(2022)不断丰富创新驱动相关研究并将创新理论应用于制造业、服务业等不同行业,拓展了理论的应用边界(湛军和张顺,2023)。通过系统梳理现有创新领域文献可知,与创业活动高

① 资料来源: <https://carlsonschool.umn.edu/faculty/shaker-zahra>。

度相关的创新驱动因素可归为三类，即技术创新驱动、制度创新驱动以及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蔡莉等，2021）。技术创新驱动是指通过新技术开发和工艺升级而对企业产品等方面所带来的非线性且迭代性的创新结果（Sepasgozar et al.，2019），强调技术创新是企业创业活动的驱动因素（Lyytinen et al.，2016；余菲菲和王丽婷，2022）。制度创新是从国家宏观层面上进行政策等方面的创新举措，从而助力区域经济发展（马述忠和郭继文，2022）。制度创新主要强调通过制度变革来推动绩效提升和经济发展，其中企业层面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产权制度创新、管理制度创新等内容（邱国栋和马巧慧，2013）。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是指在随着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而促使产品生产、营销等流程实现变革，进而催生出新的价值创造模式（李飞和乔晗，2019）。

值得注意的是，三类创新驱动因素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彼此高度相关。其中，技术创新是基础（Romer，1986），无论是小的技术进步抑或是全新的技术出现，均对企业成长和行业发展具有渐进式或颠覆式的影响（Liu等，2020）。商业模式创新则能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有机地融合起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同时商业模式创新有助于多主体差异化的主体价值主张所带来的冲突，从而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并完善组织制度构建。此外，不同于过去短缺经济时代中的要素驱动发展模式，在当前资本、金融等要素冗余的市场环境中，涌现出诸多IDE成功的创业案例，如我国在神州系列飞船、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制造以及工业互联网平

台的构建等方面已充分体现出创新驱动的强劲动能，具有环境适应性特征。Zahra教授认为，IDE的主要特征是“重组创新基础”，这导致竞争对手很难在早期预测IDE创业者的增长轨迹，因为其在完善新兴的商业模式和市场定义时，通常不得不与多个结构性、制度性的市场和技术问题作斗争。这再次增加了IDE的不确定性。IDE带来的一个有趣的特质是，它们还重构了在特定行业取得成功的必要能力，对现有参与者造成严重破坏——包括对根深蒂固的行业领导者的颠覆。

由此可见，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将创新和创业理论有机整合，形成创新驱动创业这一符合新发展阶段的原创性构念是回答时代之变的创新举措。IDE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联系紧密。从活动目的上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IDE的目的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在于国家形成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IDE正是创新驱动下所进行的创业活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必要手段，企业等各类主体实施IDE的动机在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从创业过程上看，IDE是指企业等主体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的单独驱动或组合驱动下开展的创业活动。与以往粗放式发展不同，开展IDE的企业家更注重公司的内涵式发展，关注要素的投入产出比，IDE过程中的要素投入已经由传统创业要素投入转变为创新要素投入，同时企业更加强调高附加值的商品产出或服务提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新发展理念，该理念的核心在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创新关注的是经济发

展的动力问题,作为国家实施创新的有效路径,IDE与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之间高度相关,企业等主体在进行研发、制造、营销等IDE过程时,不仅要始终贯彻绿色低碳的理念,注重IDE过程符合绿色环保要求,同时也进一步改善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另外,随着IDE在国内各地区不断涌现,国内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得到缓解,资源可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进而促进资源共享。因而,总体上看,IDE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微观基础,其从微观层面上回答了我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问題。

二、IDE成功的关键要素

IDE始终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探究IDE成功的关键要素有助于明晰IDE的前提和基础,助力公司顺利实施IDE。资源基础观指出,企业所具有的价值、稀缺、难以复制和不可替代的资源是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Barney, 1991)。Timmons(1991)指出创始人和创业团队成员是创业的关键要素之一,突出强调了人在创业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党的二十大也将人才视为第一资源,强调人才是创新的第一动力以及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国之大计。本文从人力资源视角出发,遵循分类研究思路,探讨管理者(企业家和创业者)和团队成员(科技创新人才)这两类人力资源对IDE成功的影响作用。根据资源基础观,并结合IDE所具备的创新属性,研究发现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企业家创造力提升成为IDE成功的关键性要素。

具体而言,IDE成功的关键在于解放两种生产力,即激发科技创新人才潜能和发挥企业家的创造力。

一方面,从团队成员视角看,可通过制度创新来解放科技创新人才的生产力,从而促进IDE。具体而言,科技创新是IDE的基础,而科技人才则是创新的源泉。为解放科技创新人员的生产力,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为促进IDE而做出了系列政策安排,政府将科技人才培养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始终围绕人才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激励等(李天宇等,2022)。例如,2015年,中央印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国家对科技体制改革进行全方面布局,通过覆盖面更广泛的科研项目资助以及更灵活的科研资金管理形式来激发科技创新人才的创造活力。例如,2022年国家自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分别增至415项、630项,表明诸多青年学者们积极开展基础性研究工作,愿意从事科研领域探索。截至目前,《方案》所部署的143项均已完成。2021年,中央制定并积极推进了《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以下简称《方案》(2021-2023)],在《方案》(2021-2023)指引下,国家将科技成果的使用、处置与收益权尽可能多地赋予给了科技创新人才,科技人才在享有更多授权的同时,可在任务需要范围内获得较大的便利,但同时科研人员也将承担相应的责任,国家借助人才评价制度、责任制等方式对履职不到位的科研人员进行有效监管,借助制度创新来唤醒“双创”人才的创新热情并促进科技人才发挥生产力作用。在政策实施

效果方面，截至 2022 年末，全国共登记技术合同 77 万余项，技术合同成交额超 4.7 万亿元，比 2021 年分别增长 15.2% 和 28.2%。实践证明，在政策指导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在快速提升，国家政策的作用效果是长期且正面的。由此可见，构建起促进广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创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尤为关键（陈劲等，2022）。

另一方面，从管理者视角看，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解放企业家和创业者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从而进一步促进 IDE。具体而言，党的二十大指出企业将发挥科技创新主体力量，明确了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定位（柳卸林等，2021）。同时，企业是创业的主体力量，IDE 过程有待各类企业的大力推动（蔡莉等，2023）。企业家和创业者是全面整合公司科技资源、财务资源、管理资源以及相配套的人力资源的最为关键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制定战略决策以及引领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Liu & Atinc，2021）。企业家和创业者在有效识别外部环境机会和内部资源能力的基础上进行战略选择，因而，作为重要的外部情境因素，营商环境对于创新能力提升和企业成长十分重要。营商环境涉及金融、市场、教育等诸多方面内容（Lim et al.，2010）。一方面，国家要不断深化供给侧改革，通过将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向科技领域集聚，在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促进创新驱动型创业活动的发生，进而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要积极推动国内和国际双循环，通过将国际资源要素引入国内市场来促进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内创业热情，最终实现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间的互联互通，从而促进新发展格

局的形成。由此可知，要想解放企业家和创业者的生产力，国家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柳卸林等，2021）。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新企业建立（Aldrich & Ruef，2006）并提升区域创业活跃度（杜运周等，2020）。

最后，应促进科技人才和企业家的价值共创，主要促进科技创新人才和企业家围绕 IDE 进行有效互动，重点在于分享 IDE 知识。正如 Zahra 教授指出的那样，整合和重组不同的知识链、发展激进的创新、部署资源以实现这些创新有效地转向产品的能力对 IDE 的成功至关重要。知识分享活动有助于促进 IDE 知识的翻译和利用。虽然知识共享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新获得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必须进一步翻译，以使其易于访问和使用。例如，通过解释技术术语或澄清其不同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关联。潜在的企业家还需要了解创新的本质特征并加以利用。

综上，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 IDE 主要依靠解放两种生产力并使其密切合作。一是通过制度创新来解放科技人才的生产力，从而在源头上促进创新性成果的商业化；二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解放企业家/创业者的生产力，从而促进科技成果服务于价值创造过程；三是建立科技创新者和创业者共享 IDE 知识的长效机制。

三、发挥多主体在 IDE 过程中的作用

正如 Zahar 教授指出的那样，导致 IDE 成功的因素在本质上是多层次的，主要包括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和宏观因素。从创新到 IDE 的

活动不是例行的或自动的。同样的观察结果也适用于从 IDE 到创新的活动。这需要多个 IDE 主体的有效互动。前文已经从个体层面阐述了科技人才和企业家释放创造力和生产力的途径。本文以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从资源视角出发,探究组织层面的创业资源以及宏观层面的资本市场对 IDE 成功的影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提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党的二十大也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积极发挥好政府作用,激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这将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鉴于在中国独特情况下,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对企业创新资源识别、获取和利用过程阐述时,重点关注在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创新要素分配,从而更有助于明晰企业 IDE 过程中的创新资源的来源。截至目前,创新驱动创业相关的市场要素已经非常丰富(沙德春和孙佳星,2020),尤其是对 IDE 具有支持性作用的科技人才等科技创新资源以及与创新驱动创业相配套的资本市场要素。

具体而言,从组织层面看,以科技创新资源为例,企业在进行 IDE 时需跨越组织边界进行科技创新资源的获取,进而为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Chesbrough & Crowther, 2006)。其中,科技人才是重要的创新资源(程聪慧和钟燕,2023),鉴于此,政府加大力度进行科技人才的培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和人才是国家战略发展的支撑力量,国家要着力发展创新人才。国内各

类高等院校积极落实党中央精神,进行科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及注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集中力量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致力于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充足的科技创新成果和科技型人才(葛宝山和赵丽仪,2022)。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小型企业可借助区域、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丰富科技创新资源来进行细分行业先进技术的研发,进而帮助企业进军国际市场(Dabić et al., 2020),例如光锋科技在国内外丰富科技资源的支持下,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在激光显示方面具有全球领先技术的国际化企业,其核心产品在万亿级产业中得以应用,应用领域涉及激光行业、电子视像行业等,引领行业向前发展。

从宏观层面看,发达的资本市场是 IDE 成功的关键。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各国纷纷开始构建起资本市场,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东京、中国香港等地陆续成立了证券交易所,这使得全球市场中的资金供需双方借助这一平台可实现直接对接,进而加快了融资去中心化进程(吴晓求等,2023)。中国国内也形成多元化的资本市场,除了香港和台湾外,上海、北京和深圳也成立了证券交易所,进而形成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以及新三板之间相辅相成的多元化的资本市场结构。成熟的资本市场有助于将散户投资者资金进行集聚,从而优化市场资源配置(Barber & Odean, 2000; 蔡贵龙等,2022)。当前资本已呈现出冗余态势,成熟的资本市场为企业等创业主体提供了良好的融资渠道,帮助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向科技创业型企业聚集,助力企业开展创新驱动型

创业活动。成熟的资本市场和丰沛的科技资源为广大中小型企业提供了创业机会，因而 IDE 的主体逐渐由精英全体转变为大众创业群体（陈劲等，2022）。如之前市场经济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而现在创业主体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同时各省份均涌现出在细分技术领域极具竞争力的专精特新企业，这为 IDE 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此外，正如 Zahra 教授指出的那样，鉴于战略和社会价值，不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已积极促进 IDE。政府主要在基础层面上发力，通过完善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基础设施、构建数字经济平台等方式来引导和支持各类创业主体进行 IDE。具体而言，一方面，政府在集成电路、AI 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设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代表着中国科技最先进的水平，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强有力的支撑。国家重点实验室可有效协调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中介等机构之间的关系（王婉娟和危怀安，2016），进而产出在数量、质量以及影响力等方面更具代表性的创新成果（Albert et al., 2013）。另一方面，国家注重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例如，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为响应广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国家在 2022 年发布了数字资源综合平台，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级数字生态平台将对数字资源进行规范化管理，允许企业进行数据资源注册备案、信息追溯等操作，力求通过完善数据资产制度的建立来保障企业数据要素安全的同时，助力数字技术引发的 IDE 方面的探索（Luo et al., 2023）。同时在政府层面上，国家也进行了数字政府建设，借助数字等技术来优化政府

治理流程和模式，从而更好为企业等各类主体的创新驱动创业活动提供服务（韩春晖，2021）。

综上，多种市场主体的有效互动是实现 IDE 的关键，大量的 IDE 活动是促进新的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四、未来研究展望

Zahra 教授在其 IDE 专论中指出，近年来，IDE 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强大力量。鉴于其对社会、技术和经济影响，人们对培育和促进 IDE 有着广泛的关注。但是，相关的理论研究却存在很大的不足。结合其提出的研究课题，我们认为，未来研究应该从国家、企业、个体等不同层面以及国企、民企、外企等不同主体等方面开展分类研究（蔡莉等，2021），这样有助于揭示 IDE 的内在规律。本文将从企业主体视角阐述 IDE 未来的研究重点。

首先，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专精特新企业是向着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与新颖化方向发展的一类中小企业，这类企业长期在细分技术领域深耕（Simon, 2009; Johann et al., 2022），是实现关键技术攻坚的主导力量，诸多企业已发展成为细分技术领域的“专家”（葛宝山和赵丽仪，2022），因而专精特新企业是 IDE 的重要主体之一。专精特新企业发展遵循“精一”管理学思想（陈明哲，2016），将所有可用资源集中于全球细分技术领域，力求在科技领域获得重大关键技术突破。目前超六成的专精特新企业深耕于工业基础领域，超九成的专精特新企业在为国际知名企业提供配套的零

部件等产品,这些企业为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以及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是制造业由“大”转“强”的关键。我国自2019年起评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同时各省市政府也在评选各类专精特新企业,国家由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了“阶梯式”专精特新培育体系(雷李楠和谭子雁,2021),从而在融资、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给予专精特新企业必要的帮助。未来研究可以以专精特新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长期聚焦细分技术领域,致力于突破关键“卡脖子”技术瓶颈的专精特新这类重要主体的IDE过程。具体而言,未来研究应深入剖析由数字技术以及膜处理等绿色环保技术驱动的技术IDE模式与由企业、用户、供应商等主体之间建构的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共创方式所驱动的商业模式IDE模式之间的异同点,同时关注不同创新驱动方式间的协同作用,例如从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共演化视角探究专精特新企业IDE内在机理等。另外,鉴于中小企业受到较大的资源约束,需要从区域创业生态中获得助力,因而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国家政策等区域创业生态环境对中小企业的外部资源的识别和获取以及IDE过程的影响机制,从而更好地为我国中小企业提供成长路径。

其次,对于大型企业而言,虽然数量上不如中小型企业多,但是就单个企业而言,大型企业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因而大型企业是IDE最为关键的主体之一(Karimi & Walter, 2016; 陈晓红等, 2020)。大型企业可分为两类,即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就大型国企而言,国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主导地位(Tang et al., 2017),国企承担着引领整

个产业发展的重任,国家往往赋予其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经济增长等特殊使命。例如,一汽集团作为“中国汽车的摇篮”,承担了制造第一台国产汽车的重任,同时也是吉林省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在新时代下,一汽集团不断深化改革,并在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汽车产业向着低碳化、智能化方向不断迈进。相比于国企而言,大型民企在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创新模式等方面更为多样化(余汉等, 2023)。以华为为例,华为在任正非董事长的带领下长期在ICT领域深耕(武亚军, 2013),每年投入大量经费用于新技术开发和新产品研发,同时采取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相互耦合的创新驱动方式来开展创业活动(喻登科和严红玲, 2019)。此外,华为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提出平台与生态双轮驱动模式,构建了华为云平台。目前华为凭借5G、AI、OS等技术已经成为ICT行业全球领先的制造企业。总的来说,大型企业主要通过内创业的方式进行IDE活动(张玉利和宋正刚, 2022)。在IDE发展中,大型企业通过构建行业平台、承担与创新驱动发展相关的国家级重大项目、推动其他IDE型组织发展等方式来发挥作用。未来研究可根据学者们各自的研究目的从分类视角探索国企、民企等不同类型的大型企业在IDE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鉴于不同行业的大型企业在功能、市场竞争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未来研究可借助多案例间的比较研究来归纳得到普适性的IDE模式。由于大型企业往往肩负行业发展重任,因而研究可进一步从产业等中观或宏观视角来探索在IDE过程中,大型企业对所在产业集群或国家创业生态系统的间接影

响机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大型企业需符合时代发展特征，在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未来研究应关注大型企业如何在数字技术等新型资源的支持下开展 IDE 的问题。

最后，党的二十大指出，在新时代中仍要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发，鼓励各类企业借助“一带一路”来进行国际化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在产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将为我国各类企业带来巨大的机会窗口，不论企业规模大小，还是所有制性质如何，中资企业均可通过综合考虑内部资源、能力以及与外部国际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来谋求自身发展。因此，我国企业努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外投资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借助与全球范围内的行业领军企业建立网络关系来开展 IDE 活动，从而提升所在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此外，从国家层面上看，政府需要从产业发展视角对我国各类产业进行规划，如大力推进、高铁、光电、航空等优势产业在沿线国家的战略布局，同时在高新技术领域与其他国家进行深度合作，进而帮助我国企业扩展国际市场份额并提升其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未来研究应结合“一带一路”等中国情境来探究各类企业的 IDE 问题，例如，关注“双循环”等特殊背景下中资企业创新驱动国际创业的新发展路径问题，探究中国政府对市场 IDE 活动的关键影响作用。此外，未来研究可从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与资金链之间的深度融合视角来关注和探索 IDE 的内在机制问题，进一步探究跨越国界的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动对宏观国家 IDE、中观产业 IDE、微观企业 IDE 的差异化影响，从而拓宽 IDE 的适用情境。

作者简介

葛宝山 (E-mail: gebaoshan@vip.163.com), 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教授、工商管理专业(创新与创业管理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企业管理专业(国际创业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 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 吉林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技术创新与创业分委会共同理事长; 英文期刊 *Journal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Management* 共同主编; 《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期刊编委。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 项、重点项目子课题 3 项)、国家发改委基金(1 项)、科技部软科学基金(1 项)、吉林省科技厅项目(5 项)、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3 项)等基金项目多项。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吉林省长春市科技进步奖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吉林省首届拔尖创新人才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并入选吉林省人民政府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人才支持计划。已在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Internet Research*、*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以及《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 150 余篇。代表性学术成果为“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ssessing Measurement Invariance in the Construct”, 发表在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2 年第 4 期)。

赵丽仪 (E-mail: zhaoly20@mails.jlu.edu.cn), 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目前已经累计录用或发表科

研成果十余篇,所发表的期刊包括《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管理学报》和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等。博士阶段主要在创业管理领域进行相关的科研活动。

参考文献

[1] Zahra, S. A.:《创新驱动创业: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催化剂》,《管理学季刊》,2023年第4期。

[2] 蔡贵龙、张亚楠、徐悦,等:《投资者—上市公司互动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基于权益资本成本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2年第8期。

[3] 蔡莉、张玉利、蔡义茹,等:《创新驱动创业:新时期创新创业研究的核心学术构念》,《南开管理评论》,2021年第4期。

[4] 蔡莉、张玉利、陈劲,等:《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笔谈》,《外国经济与管理》,2023年第1期。

[5] 陈劲、阳镇、张月遥:《共同富裕视野下的中国科技创新:逻辑转向与范式创新》,《改革》,2022年第1期。

[6] 陈明哲:《精一管理:企业永续经营的生生之道》,《清华管理评论》,2016年第12期。

[7] 程聪慧、钟燕:《科技人才政策影响城市创新的路径研究》,《科研管理》,2023年第3期。

[8] 杜运周、刘秋辰、陈凯薇,等:《营商环境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模式——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分析》,《管理世界》,2022年第9期。

[9] 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

[10] 葛宝山、赵丽仪:《创业导向、精一战略与隐形冠军企业绩效》,《外国经济与管理》,2022年第

2期。

[11] 葛宝山、赵丽仪:《隐形冠军精一创业能力生成机理及路径研究》,《科学学研究》,2022年第10期。

[12] 韩春晖:《优化营商环境与数字政府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13] 李飞、乔晗:《数字技术驱动的工业品服务商业模式演进研究——以金风科技为例》,《管理评论》,2019年第8期。

[14] 李天宇、温珂、黄海刚,等:《如何引进、用好和留住人才?——国家科研机构人才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年第9期。

[15] 柳卸林、魏江、陈劲,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经济管理》,2021年第1期。

[16] 马述忠、郭继文:《制度创新如何影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来自综试区设立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2年第8期。

[17] 邱国栋、马巧慧:《企业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内生耦合——以韩国现代与中国吉利为样本的跨案例研究》,《中国软科学》,2013年第12期。

[18] 沙德春、孙佳星:《创业生态系统40年:主体-环境要素演进视角》,《科学学研究》,2020年第4期。

[19] 王婉娟、危怀安:《协同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实证研究》,《科学学研究》,2016年第3期。

[20] 武亚军:《“战略框架式思考”、“悖论整合”与企业竞争优势——任正非的认知模式分析及管理启示》,《管理世界》,2013年第4期。

[21] 余菲菲、王丽婷:《数字技术赋能我国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路径研究》,《科研管理》,2022年第

4 期。

[22] 余汉、黄爽、宋增基：《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中国软科学》，2023 年第 3 期。

[23] 喻登科、严红玲：《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二元耦合组织成长路径：华为 30 年发展历程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 年第 23 期。

[24] 湛军、张顺：《服务创新理论 40 年：境外研究脉络与发展》，《科研管理》，2023 年第 5 期。

[25] 张玉利、宋正刚：《内创业的本质及实践促进的学术研究》，《软科学》，2022 年第 8 期。

[26] 陈晓红、蔡莉、王重鸣，等：《创新驱动的重大创业理论与关键科学问题》，《中国科学基金》，2020 年第 2 期。

[27] 雷李楠、谭子雁：《“单项冠军+小巨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互补力量》，《清华管理评论》，2021 年第 12 期。

[28] 吴晓求、方明浩、何青，等：《资本市场成长的逻辑：金融脱媒与科技进步》，《财贸经济》，2023 年第 5 期。

[29] Akcigit, U. , Grigsby, J. , Nicholas, T. , et al. 2022. Tax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7 (1): 329–385.

[30] Albert, B. , Inés, M. , & David, P. 2013. Research output from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ve projects.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7 (1): 71–81.

[31] Barber, B. M. , & Odean, T. 2000. Trading is hazardous to your wealth: The common stock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5 (2): 773–806.

[32] n. , 1991. ,

[33] Chesbrough, H. , & Crowther, A. K. 2006. Beyond high tech: Early adopters of open innovation in other industries. *R & D Management*, 36 (3): 229–236.

[34] Dabić, M. , Maley, J. , Dana, L. , et al. 2020. Pathways of SME internationalization: A bibliometric and systematic review.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5 (3): 705–725.

[35] Drejer, I. 2004. Identifying innovation in surveys of services: A Schumpeterian perspective. *Research Policy*, 3: 551–562.

[36] Karimi, J. , & Walter, Z. 2016.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disruptiv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doption, and its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the newspaper industry. *Long Range Planning*, 49 (3): 342–360.

[37] Li, W. , Gill, S. A. , Wang, Y. , et al. 2022.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Through the juxtapose of Schumpeter’s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broaden– and –build theor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927458–927458.

[38] Liu, J. , Chang, H. , Forrest, J. Y. , et al. 2020. Influ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158: 120142.

[39] Liu, X. , Atinc, G. 2021. CEO selection, reference setting, and postsuccession strategic change. *Management Decision*, 59 (2): 258–284.

[40] Luo, S. , Yimamu, N. , Li, Y. , et al. 2023. Dig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 could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mprove green innovation in China? .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32 (4): 1847–1871.

[41] Lyytinen, K. , Yoo, Y. , & Boland, Jr R. J. 2016. Digital product innovation within four classes of innovation networks.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6 (1): 47–75.

[42] Porter, M. 1990.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

tions. Aldershot: Ashgate.

[43] Schumpeter, J. A.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4] Sepasgozar, S. M. E., Hawken, S., Sargolzaei, S., et al. 2019. Implementing citizen centric technology in developing smart cities: A model for predicting the acceptance of urban technologie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142: 105–116.

[45] Tang, J., Tang, Z., & Cowden, B. J. 2017.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CEO dual values, and SME performance in state-owned vs.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1 (6): 883–908.

[46] Toivonen, M., & Tuominen, T. 2009. Emergence of innovations in services.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9 (7): 887–902.

[47] Toth, A., Juhasz, T., & Kalman, B. 2022. The role of innovation and human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central Europe. *Montenegrin Journal of Economics*, 16 (1): 251–274.

[48] Aldrich, H., & Ruef, M. 2006. *Organizations Evolving* (2nd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49] Johann, M. S., Block, J. H., & Benz, L. 2022.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hidden champions: Evidence from German manufacturing firm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9 (3): 873–892.

[50] Lim, D. S. K., Morse, E. A., Mitchell, R. K., et al. 2010.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s: A comparative business systems perspectiv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0, 34: 491–516.

[51] Simon H. 2009. *Hidden Champion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Success Strategies of Unknown World Market Leaders*. New York: Springer.

[52] Timmons, J. A. 1999. *New Venture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for 21st Century* (5th Ed). Homewood, Illinois: Irwin-McGraw-Hill, 1999.

IDE: Micro-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oshan Ge Liyi Zhao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to form the original concept of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IDE),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is an innovative measure to answer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In practi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putting innovation at the primary pos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IDE activities in China.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DE can be traced back to Schumpet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Subsequently, scholars such as Porter (1990), Cai L, et al. (2021) discovered the uniqueness of innovation-driven and expanded the boundary between Innovation Theory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creatively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ID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Professor Shaker Zahra’s discourse on ID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 motivation, it elaborat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D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ity objectives, IDE is a necessary mean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motivation for various entities such as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IDE is to promot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IDE refers to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enterprises and other entities under the single or combined innovation-driven facto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r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ults, with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IDE activities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various regions of the country has been alleviated, and resources can be optimized and allocated on a broader scale, thereby promoting resource sharing. It can be seen that IDE is the micro-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innovation-driven factors in ID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echnology, institutions, and business models. The three types of innovation-driven factors are not in opposing relationships, but high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is the process of actively and creatively solving uncertainty problem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key to IDE is to liberate two types of productivity, namely the productiv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alents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entrepreneurs. During the IDE process, need to fully leverage the role of multiple market entities. Finally, this study provides prospects for future ID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fferent enterprise entities.

Finally, this study provides prospects for future ID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fferent enterprise entitie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on SRDI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alization, refinement, differenti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take this type of enterpri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exploring the IDE process of important entities such as SRDI enterprises that focus on segmented technology fields for a long time, and are committed to breaking through “bottleneck” technology bottlenecks. Given tha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re subject to significant resource

constraints, enterprises need to obtain assistance from the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other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external resourc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e IDE process, in order to better provide growth path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China. For large enterprises, future research can explore the important role of different types of large enterprises such as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IDE from a classification perspective, and use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multiple cases to summarize universal IDE models. Due to the fact that large enterprises often take on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future research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indirect impact mechanism of large enterprises on the industrial cluster or 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in the IDE process from a meso-perspective or macro-perspective such as industry. In addi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h of innovation-driven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by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special context of “dual circulation” in the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cross-border technology, talent and other factors on macro national IDE, meso industry IDE, and micro enterprise IDE should be explored, in order to broaden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he IDE.

Key Words: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spects